

# “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 论薛凤祚的思想转向及其价值

王 坚

**摘 要:** 今人视为科学家的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原因不在于“王学空疏”而引起的思想离异,而在于孙奇逢当时所教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和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正是由于鹿善继、孙奇逢的首先引导,使得薛凤祚在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无限发展可能的环境中,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以《易》为蓝本,以传统的“天”意识为依托,以实用为归宿,以平分中西基础上会通为手段,思想逐次展开。正是这种会通模式的一致性,把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思路推向一个新境界,使得薛凤祚的思想与夏峰北学其他同仁一样显得与众不同。但由于清初皇权主义重建及其意识形态调控导致的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明清之际理学变革最终以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回归收场,正是在此情况下对夏峰北学学者思想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会通必要性的消失,使得包括薛凤祚在内的夏峰北学都难以理解。

**关键词:** 薛凤祚; 孙奇逢; 天人; 实用; 皇权; 明清理学转向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史论研究及儒家史论文献汇编”(编号:12RWZD08)

**作者简介:** 王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 一、薛凤祚的生命历程、思想转向

薛凤祚(1599—1680),字仪甫,号寄斋,山东益都(今淄博市临淄区金岭镇)人。其祖父薛岗是明朝万历年间举人,一生放浪形迹,拒官未仕。父薛近洙,明朝万历进士,是朱熹、薛瑄、陈献章的信奉者,自身也受过系统的理学教育,官至中书舍人,为官清正,因不满魏忠贤擅权而辞官还家,专门从事经学研究及著述。<sup>①</sup>薛凤祚“少承家学”,从父辈接受了启蒙教育。他读五经四书,补廪生。天启年间,他出外游学,先后受业于鹿善继和孙奇逢。薛凤祚师从二人之后,治理学,“尝慨然欲有建树于时,不为空谈以炫人耳目,先生俱得其学”,<sup>②</sup>于是,“通理学,精易经”,<sup>③</sup>著《圣学心传》,“发明‘认理寻乐’之旨,又讲求天文地理实用”。<sup>④</sup>此书编辑了鹿善继的《四书说约》和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首为鹿善继的《认理提纲》和《寻乐大旨》,然后是鹿善继、孙奇逢的传记。薛凤祚对此书颇为自诩:“此书出,当与孔、曾、思、孟四圣贤书共揭星日而行中天。”<sup>⑤</sup>明清之际,薛凤祚返乡,运用所学投入组

① 参见《薛氏世谱》全一册,1931年,第4页。

②③ 《薛氏世谱》第1册,薛氏本族后人1995年整理编写本,第4、45页。

④ 阮元《儒林传稿》卷三,清嘉庆刻本,第34页。

⑤ 永瑢《圣学心传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页。

织乡民抗击贼寇活动,比如兵法方面,“先生富明季乱时,练乡勇,修商山堡自固。战阵之方,攻守之具,颇能出新意于古法之外。一时郡县多被焚掠,环先生所居五十里,盗贼无敢犯者”。<sup>①</sup>比如,所学修城之法,“按此法传自西洋之穆尼阁,明季入中国,青州薛凤祚从之游,撰历学会通一书,书后略附其法。崇祯十三年己卯,知县杨蕙芳修城时得薛凤祚法,与县人谋建空心楼十一所,后经王茂德之乱,数万人战城下者三月,赖城之利,竟得保全。郡城亦用其法迄今不改”。<sup>②</sup>明清鼎革后,薛凤祚选择了遗民生活,“自以明诸生,不复求闻达”。<sup>③</sup>张侗曾在《瑯琊放鹤村蓬海先生小传》中记录当时的盛况:先生既以山水朋友为性命,于是乘州织水、莱子国山公、云门笠者、故王孙适庵、愚公谷仪甫、蓟门东航子习仲、渠丘昆右,与同乡髯叟子羽、渔村、栩野诸君子。德业文章,超绝一世。<sup>④</sup>后曾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修《山东通志》时负责天文历法部分,与张尔岐、李焕章、顾炎武交游来往,康熙十五年,河道总督王光裕聘请薛凤祚佐治黄河和运河,薛氏以76岁高龄,“躬历数千里,考黄淮漕运利害曲折,施有成效”。<sup>⑤</sup>

综观薛凤祚的一生,学凡三变。万历四十四年(1616),17岁从学鹿善继、孙奇逢。<sup>⑥</sup>后“癸酉(1633)之冬,予从玉山魏先生游,得开方之法”。<sup>⑦</sup>由于魏文魁在晚明中西历法辩论中失败,薛凤祚师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系统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并接受了西方科学的新成就,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数理论等,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薛凤祚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长于天文历法、数学,兼通水利、医学、机械、军事和占验等,著有《历学会通》、《天步真原》、《两河清汇》、《圣学心传》、《气化迁流》、《车马图考》、《甲遁真授秘集》、《乾象类占》等。除《天步真原》与穆尼阁合作翻译外,余皆有自己的创见。其《历学会通》分《正集》12卷、《考验》28卷、《致用》16卷三部分,共56卷,内容涉及天文、数学、医药、物理、水利、火器等。在中国科技史上,他最先采用哥白尼日心说,是对数引入第一人。总的来看,他对于沟通中、西科学作出了贡献,故当时有“南王(锡阐)北薛”之称,后世誉为清代“畴人之功首”。<sup>⑧</sup>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以后的研究中,学术界基本上都把薛凤祚定位为“畴人”或者科学家。正是这种研究模式,导致对薛凤祚思想的难以理解,比如,薛凤祚为什么引进西方知识的同时却进行大幅度的删改以致于连梅文鼎都抱怨简化太多而难以读懂?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致用?就是致用,难道这些知识在西方发展了千年,按照原著引进中国就会没用?薛凤祚的致用倾向来自于何方,受谁的影响?为什么在引进西方天文知识的同时还要去关注星占术,以至于晚年对之留心不已?有学者认为这是其“经世意识”的表现,<sup>⑨</sup>但问题是经世就必须关注占星术?就算是经世,但为何会采用如此形式?还有就是会通观念,为什么薛凤祚把西方天文历法知识与古代中国传统天文知识会通却又不相信“西学中源”?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实际上,综观帝制中国以致整个前近代社会,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性科学家?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多种知识资源充斥且无限发展的大时代。笔者认为:薛凤祚的知识背景应该是多元,而不可能是单维的,不然,他为什么要会通以求“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

所以,总的来看,薛凤祚的思想随着其思想转向应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弱冠之年师从鹿善继、孙

① 徐世昌《夏峰学案》,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页。

② 成瓘:《道光)济南府志》卷八,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178页。

③⑤ 《薛氏世谱》第1册,第5页。

④ 参见张侗《放鹤村文集》卷一,山东省博物馆藏,清刻本。

⑥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孙奇逢)三十三岁。在京师,薛凤祚、唐灼州、贾孔澜各遣子受学。(薛之子凤祚,贾之子尔霖。后先生以长女妻尔霖)”。参见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84页。

⑦ 薛凤祚《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2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⑧ 赵尔巽《畴人传一·薛凤祚传》,见赵尔巽《清史稿》卷五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934页。

⑨ 参见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教学》2010年第18期。

奇逢,所以思想具有燕南王学及随后的夏峰北学之特征;①后师从魏文魁,所以,思想具有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近50岁左右先后师从传教士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等,因此,思想也具有西方科学知识背景,但因为“受新法,尽传其术,亦未尝入耶稣会”,②所以,他对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宗教知识应该是感情不深的。在这几种知识资源中,应该说魏文魁对其思想的影响应该相对有限,要不薛凤祚也不至于近50岁还转投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另外两种知识资源,有学者认为“弱冠之年的求学生涯,特别是孙奇逢兼容并蓄的理学思想对薛凤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对薛凤祚的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③而根据笔者的观察,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对薛凤祚影响最大的恰恰应该是早年的两位老师,他们对薛凤祚的影响,特别是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其他对薛凤祚的影响是局部的、技术性的。

## 二、薛凤祚与孙奇逢关系再探讨

之所以说孙奇逢对薛凤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主要表现在:1.在孙奇逢南迁河南之后,薛凤祚与孙奇逢的往来并没有中断,二人的师生关系进一步加强;2.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④——“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⑤——与孙奇逢思想完全一致,由此,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⑥与孙奇逢会通理学各派重建儒学的模式如出一辙。

先看第一点,在孙奇逢与薛凤祚关系上,有学者认为薛凤祚转向天文方面是因为“深感王学‘无致用之实’,毅然与理学决裂而献身科技,投身经世之学”。⑦其实晚明之际学术界之间的互动转化远远超出这种单线条的认知。一般来说,有用无用与否,不单在学术思想本身而更多在于对比优势和当时社会的需求,王学较之于现代科技知识固然用处有限,但较之于当时其他思想则更为有用。把明朝灭亡责任推给晚明知识界特别是王学,那只是清初理学官僚在配合皇权主义的重建中思想定于一尊之时构建的神话。其实在面临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引起的危局之时,知识界都在各种知识资源中辗转腾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此开始了晚明的儒学变革运动。在此种境遇中,没有儒生不以经世相标榜,但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经世意见不一。而就是在此过程中,“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

① 燕南王学与夏峰北学都是明清之际由北方儒生集团开创的两个前后相继的地域性学派,因此,其基本内核一致。在晚明,随着阳明学北传,在北直隶儒生集团中间形成了以阳明学为核心内容,吸收北方理学的致用传统的燕南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鹿善继与孙奇逢;而到清初,因为鹿善继抗清殉国,孙奇逢南下河南转而开创夏峰北学。

② 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天学会通订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页。

③ 郑强《补空谈之虚空——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④ 笔者之所以把“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定位为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主要依据薛凤祚在明清之际从事的事业——天文历法(“天学”)。既然从事天文,当然要“本之于天”,从事历法,必然要追求“实用”,而其综合的结果就是薛凤祚的思想以此两个基本点展开。

⑤ 关于薛凤祚的致用意识,因为近两年来学者研究颇多,兹不详述。总的来看,包括以下方面:精简西学知识及实际实用技术,便于使用;注重中西传统科学知识中的致用因素,当然也由此导致热衷于占星学的流弊。

⑥ 关于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模式,参见马来平《“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哲》2012年第2期。

⑦ 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北方”。<sup>①</sup> 所以,虽然薛凤祚在具体认识上与孙奇逢有所差异,但要走向经世就要“背弃师门”,<sup>②</sup>恐怕是危言耸听。况且:1. 清初,孙奇逢承接北直隶儒生集团遗产为北方遗民领袖而在当时学界处于中枢地位,因此,与之来往的儒生基本都仰孙奇逢为北学“泰山北斗”,就是顾炎武、张尔岐也尊孙奇逢为耆儒、老师。也正是如此,黄宗羲在不知其学术“浅深”的情况下将之列入《明儒学案》作为殿军,所以,作为其早年弟子及遗民的薛凤祚“背叛师门”,不可信;2. 综观孙奇逢一生,他并不反对西学;相反,其至交同学里面有从事西学者,他只是对天主教教义好感不多而已。

就现有资料来看,薛凤祚转向魏文魁及西方传教士后,与孙奇逢之间关系未断。在孙奇逢定居河南期间,薛凤祚至少两次到河南拜见孙奇逢。<sup>③</sup> 其中第二次拜访记录最为清晰。对于这次会见,《孙夏峰先生年谱》这样记述“薛仪甫凤祚自益都再视先生于夏峰,年七十余矣,携其所著《历学会通》两千余页来质。先生曰‘夫子之性与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于吾之性,乌知所谓天之道?不明于日用之文章,又乌知所谓性与天道哉?《乡党》一篇,夫子之饮食起居,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尝谓读古人书,任从何处领会,无不可直证源源本本。盖道惟一,二则歧,故曰:吾道一以贯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惟一故无不贯;全在圣人身上,泛应有当。俗学不能一,禅学、玄学不能贯,名家、法家不必言矣。’”<sup>④</sup>此次时间为康熙九年,孙奇逢87岁,薛凤祚71岁。而在孙奇逢90岁之时,因感念年岁以高,来日无多,因此作《怀友诗》悉数20多位传其学而各具特色的高徒,望其再接再厉,光大师门,薛凤祚赫然在列。“尼山有四友,又复借六侍。顾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诸贤时寤寐。端亮曰潜庵,当仁不肯避。明达莲陆氏,到手无棘事。定斋勇向学,识力何超异!定国讼往衍,晚节挾其秘。宽夫善补过,力为明学地。垂老轻去乡,荐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问借笔记。习中能知几,介祺称高寄。子新饶侠肠,仪甫具识器。”<sup>⑤</sup> 构斯安贫贱,守身明大义。浑穆称保汝,不以穷失意。退步震之贤,墟怀亦夔智。驷臣有气魄,熙侯无俗累。子石称孺慕,含真严指视。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质。振公孝友人,乾贞羨笃志。友兰与裕卿,问学渐有次。鳧盟荆园语,鄂州辨学字。廉干推逸庵,此度博综备。进德而修业,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烛光安足矧!愿言日有长,助我勿失坠”。<sup>⑥</sup> 因此,薛凤祚背叛师门或者与孙奇逢关系不佳不可信。

实际上,对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由于资料的欠缺,难以完满说明。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更多原因不在于思想的离异,而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 孙奇逢当时所交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2. 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

应该说,在孙奇逢28岁丁忧后北上京师到34岁回容城老家这7年里,<sup>⑦</sup>由于当时仰慕其为人而包括薛凤祚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子弟都拜孙奇逢门下,仅就《孙夏峰先生年谱》所载就有兵部郎杜友白(杜诗)之子、贾三槐、薛凤祚、唐灼州之子、贾孔澜之子贾尔霖等。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孙奇逢当时所

① 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3、4期。

② 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③ 关于薛凤祚第一次去河南拜访孙奇逢的情况,相关材料极少。不过笔者遍寻,有一则材料可能是对此次拜访的记录。顺治十六年“范阳三子过晤夏峰。因忆其王父有述(并序)。三子者,一马、一薛、一李。马为予姻友玉壶君之孙。薛之大父运弦,李之大夫谦所,二君皆相善。今弃世廿余年。追忆生平,淋漓杯酒,有荆高风,抚其孙枝,眷怀祖德,口占二十八字:不逮三人白下来,名驹千里自英才。故交零乱新研发,苏岑依然易水隈”。参见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404页。但由于只是孤证,笔者存疑。

④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1434—1435页。

⑤ 参见《夏峰先生集》,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938页;《孙征君日谱录存》,见《孙奇逢集》下,第1313页;《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1440—1441页;汤斌《清孙夏峰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顺治十二年癸丑九十岁条,前两者同缺“钱升阶、薛”,但不管如何,包括薛凤祚则为无疑。

⑥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怀友诗》,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939页。

⑦ 参见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1383—1384页。

教的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使得孙奇逢的教学效果大受影响。就此,《夏峰先生集》有《与薛孔泉、唐灼州》为证。<sup>①</sup>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万历四十五年前后孙奇逢和鹿善继都是相当忙碌的。就孙奇逢来说,先是生子嫁女,而后夫人去世。<sup>②</sup>另一方面,鹿善继母亲田氏万历四十四年去世,鹿善继悲痛过度大病一场,随后虽有起色,“而终身病原遂肇于此”。随后,鹿善继丁忧在乡。<sup>③</sup>而“先生居京师六年,皆鹿伯顺、范一泉二先生为之左右”。<sup>④</sup>所以,于家、于友,孙奇逢万历四十五年归乡都势所必然。而在此之后,晚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鹿善继、孙奇逢在保家卫国间不断奔波。鹿善继虽然在丁忧后回任户部、兵部主事等,但随后万历四十七年“金花银”事件爆发,官及复官后随孙承宗镇守辽东直到明崇祯九年抗清战死,同时孙奇逢则退守乡间鼎力相助。正是如此,鹿善继、孙奇逢对薛凤祚虽有师生之谊,但再像以前一样当面教育已完全不可能。而到明清鼎革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北方士人之间的连接重构加强而形成以孙奇逢为中心的遗民集团,在此过程中,由于共同的遗民倾向和内在思想的一致性,薛凤祚所在的包括张侗、东航老人马鲁<sup>⑤</sup>及张尔岐在内的山东遗民群体与孙奇逢积极互动,最晚在此时,孙奇逢与薛凤祚的师生之谊得以重续。

再看第二点。正如上文所言,在晚明时代,思想合流基础上的会通成为时代潮流,就孙奇逢与薛凤祚而言亦是如此。虽然会通的知识资源有所差异,但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与孙奇逢思想完全一致,由此,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与孙奇逢会通理学各派重建儒学的模式如出一辙。

先看两者思想基本点的一致性。在明清之际,孙奇逢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最关键的就在于其会通理学各派而重构儒学。总的来说,孙奇逢的会通正如弟子赵御众概括的那样“先师之学,以天为归,以孔为的,以至诚为全量,以慎独为工夫,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其所以信独见而化异同者,总之以孔子印诸儒也。当看其是不是,不当问谁朱谁王。”<sup>⑥</sup>这其中,有三大基本点:天(以天为归)、孔子(以孔为的)、主于实用(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而对薛凤祚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薛凤祚思想正是在两者之间逐次展开,这是孙奇逢与薛凤祚的最大相同之处。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sup>⑦</sup>冯友兰曾归纳说“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命运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则,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sup>⑧</sup>

① 孙奇逢《与薛孔泉、唐灼州》,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706—707页。

② 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三子望雅生。冬,长女归贾氏”。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参见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1384页。

③ 关于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鹿善继丧母、患病、居乡丁忧情况。参见陈铨编《明末鹿忠节公善继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27页。

④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1384页。

⑤ 张侗(1634—1713),字同人,一字石民。清初山东诸城人。马鲁,字习仲,原名之驯,字君习,号东航老人,直隶雄县人。曾与孙奇逢在河北起兵抗清,与王余佑交好。孙奇逢南迁河南,马鲁则“复南渡献策于史可法。可法死,还居唐县。(顺治)三年来诸城,结庐九仙山之阳”。张侗与马鲁、薛凤祚为友,而后二人都为孙奇逢的早年门人。关于马鲁情况,参见王余佑《谏东航》、《寄东航》,见王余佑《五公山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261页;宫懋让修、李文藻纂:《乾隆》诸城县志·侨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8,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

⑥ 赵御众《夏峰集》旧序,见李敏修辑录《中州艺文录校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8页。

⑦ 邹新明《敬天的信仰》,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总的来看,在中国思想中,天是一个基本的知识资源,由此形成的天道意识及对天人关系的不同认知而开出了不同的思想理路,成为决定中国思想走向的巨大因素之一。也正是如此,“自上古以来,天文有世掌之官”。<sup>①</sup>“司天之说尚矣……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致谨于斯者也”。<sup>②</sup>

一般来说,“天道”的多重涵义:指‘神意’、指决定人间吉凶的天象、指天象运行的规律、指必然之理,类似于‘天命’”。<sup>③</sup>到西汉,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天人并举,到北宋理学则进一步把理与天连接而“天”‘理’合二为一,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到王阳明,以“致良知”打通天人、古今、中西、礼理等而统括之,实际上是以人之发展统括万端。<sup>④</sup>在阳明后,王学各派以此分化。而发展到孙奇逢,也积极重构天人关系,力图在“天人之间”寻求一“大把握”。为此,孙奇逢打出“学本于天”旗帜,认为虽然“从来大贤大儒,个人有个人之体贴”。<sup>⑤</sup>但“儒者之学本诸天”,“理却是天之所与”,<sup>⑥</sup>天理“包天地、贯古今、历从来”。<sup>⑦</sup>如若不如此,就是异端。

孙奇逢把学归之于天最集中体现在《理学宗传序》中。孙奇逢开宗明义提出“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者,而理未尝有所增,不得志则敛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行事与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视之。舍是,天莫属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术遂为天下裂矣。周子曰‘圣希天。’程子曰‘圣学本天。’又曰‘余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余赋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与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顺提携,时证诸先正之语。尝思之,颜子死而圣学不传,孟氏歿而闻知有待。汉、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关、闽五子大其统。嗣是而后,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焉。余因是知理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学,乃所以本诸天也。”<sup>⑧</sup>可以说,《理学宗传》的编排就是按照这一宗旨的全力贯彻。

虽然“本之于天”,但作为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儒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实际的社会统治中,孙奇逢亦如此。在河北之时,孙奇逢文武兼通、侠儒兼收,被誉为“范阳三烈士”之一,为此明清两朝前后征辟11次之多,黄宗羲称“逆阉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头烂额之不顾也。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涸,人谓自先生而再见”。<sup>⑨</sup>而南下河南之后,虽然完成从燕赵悲歌之士到一代理学大师的转变,但在学术上,仍然力主实用,傅山于康熙二年57岁时访学夏峰,就有如此观察“顷过共城,见孙钟元先生,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吾敬之爱之。不知者以为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实有一大把握。人以隐称之,非也。理学家法一味版拘,先生则不然,专讲作用。”<sup>⑩</sup>正是如此,《清史列传·儒林传上》本传说他凡是“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甚至像费密那些远在千里、跨州隔省的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

当然,在孙奇逢的思想中,“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两者也是一致而贯通的,这具体体现在《读

① 脱脱《天文志一》,见《宋史》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49页。

② 宋濂《天文志一》,见《元史》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89页。

③ 舒炜光、秉平《自然辩证法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④ 当然此“人”指圣人,非康德之“世界公民”。

⑤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见《孙奇逢集》中,第552页。

⑥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孙奇逢集》中,第1406页。

⑦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孙奇逢集》中,第1399页。

⑧ 孙奇逢《理学宗传》序一,见《孙奇逢集》上,第620—621页。

⑨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1页。

⑩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八,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8页。

易大旨》中。在此书中,孙奇逢以《易》理来作为会通框架,<sup>①</sup>扩张视野,平分朱陆,会通于圣人,进而天人合一,总归于天。具体来说就是:易之理与天地合一,又因为天地最终着落于圣人之心,所以天地圣人合一而同现于《易》理,然后以《易》理统卜筮,“理一分殊”,再在《易》理中分天、地、圣人三维展开,而落实于人事,励志于实用、人伦。合而言之,《易》之道,在天为乾,在地为坤。以形体、性情言,为天,为地,为乾,为坤,虽然“天地一气也,一数也,一道也”,因为感应,所以最终归于人事,一统于圣人,而切于人伦,此之谓“天人合一。”分而言之,则为天之天,天之人,人之天,人之人,人之天;则为本来之易,圣心之易,易书之易,咸用之易,流行之易;为六十四大乾坤世界,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以之相互运动,有因有革。但无论如何,《易》之体用,各尽其职,各效其能,总归于《易》之道,而规划人事。可以说,正是这种贯通,一方面赢得了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极高评价及全盘接受,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孙奇逢独树一帜的会通模式。<sup>②</sup>而对于薛凤祚来说,虽然其更多在于科学方面而与孙奇逢注重伦理道德的“践履”有所差异,但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与孙奇逢会通理学各派重构儒学如出一辙。他也是扩张视野,平分中西,<sup>③</sup>也中经圣人,本之于天。“他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和其他占卜者宣扬的‘天人感应’不同”。<sup>④</sup>孙奇逢是以《易》为基础沟通天、人、实用;而薛凤祚则是把《易》更加精致化,配之于奇门<sup>⑤</sup>沟通三者,孙奇逢以《易》的“元亨利贞”为骨架建构《理学宗传》,薛凤祚则以之为骨架建构《甲遁真授秘集》。孙奇逢以《易》理统卜筮,把卜筮融化在《易》理的建构中,薛凤祚也是如此。所以,总的来看,孙奇逢平分朱陆理学各派而重构理学的会通方式与薛凤祚会通中西方知识的方式虽疏密程度不一,但方法理义则同,并且都归之于实用。<sup>⑥</sup>正是如此,“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sup>⑦</sup>薛凤祚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西学中源”论而认为中西对等,无论优劣。<sup>⑧</sup>因为很简单,一旦“西学中源”,则“西学”与“中学”将地位失衡或者合二为一,会通就失去了前提。

### 三、会通的难局及其困局: 清初重建皇权视野下的思想大趋势及其整体转向

本质上,由于多重知识资源的融合引起的知识空间的扩张,晚明思想界就是会通的世界,而薛凤

- ① 孙奇逢的《读易大旨》与其他易学著作不同在于注重易理发挥而忽略细节的考证。对此,四库馆臣有细致观察。“案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凡所训释,皆先列已说,后附旧训。其平生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有足取焉”。参见永瑛:《读易大旨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第35页。
- ② 关于孙奇逢的会通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天、圣人、实用三者之间建构,先把学“本之于天”,然后天人合一而会通于孔孟,最后在实践中落实于对“礼”(伦理纲常)的“践履”。参见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
- ③ 为此,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摈弃成见,逐一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并存的五种历法:旧中法即大统历;新中法即魏文魁改立的东局历法;回回历即西域历;今西法即《崇祯历书》之历法;新西法即穆尼阁《天学真原》中的历法。本着“旧说可因可革,原不泥一成之见;新说可因可革,亦不避蹈袭之嫌”的原则,扩展视野到中国传统学术、传教士西学、术数思想、西方占星术,甚至从穆尼阁听来的哥白尼体系,“铨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参见薛凤祚:《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23册,第2页。
- ④ 聂清香、翟英伯《中西会通,天人相应——薛凤祚引进西方占星术面面观》,《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 ⑤ 奇门遁甲是一门融天人为一体、时空为一体的大学问,秉持天地人三才和谐共振,信息同步共生的基本理念。对于奇门遁甲,薛凤祚有深入研究并结成专著《甲遁真授秘集》。
- ⑥ 总的来看,薛凤祚在其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著作中,之所以会进行大量的删改,初衷就在于实用方面。“仪公讲不踰之道,而游历象之器,成务以前民用,圣人深望”。参见苾馭散汉知《天步真原引》,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23册,第436页。当然,薛凤祚的“实用”与孙奇逢的实用观有差异,孙奇逢的实用最终全部是落实在对日用人伦的实践上,而薛凤祚还注意到在引进西方科技思想中化繁为简以便于实用。
- ⑦ 乔宗方、宋芝业《术数思想: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 ⑧ 参见薛凤祚《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2辑第23册,第410页。



祚的会通思想直接来源于孙奇逢的夏峰北学,是晚明以阳明学为主导的儒学革新运动所产生的会通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推进。虽然程度不一,但这种会通思潮在夏峰北学内部应该是普遍现象,薛凤祚特异之处在于,夏峰北学其他诸子更多把此用于处理当时纷争不已的理学各派关系时,他则更多用之处理中西科学关系。虽然由于过度会通与超越预期的大量会通出现,反会通的思想也在酝酿,但直到孙奇逢时代,社会仍然动荡不已,思想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就夏峰北学内部来看更是如此。在宗师遗产与现实之间互动中,夏峰弟子都在兼容并包的学风中扩充视野,广开思路。同时,由于天的观念是混合的而不可能是单层的,因此,对他思想的理解与重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又因为大变革的明清之际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以重释“天”作为为学入手处由此转向,在夏峰弟子中,除薛凤祚之外,还有许三礼。两者的不同在于薛凤祚在重释中着力于会通中西科学知识而更具有科学意味,而许三礼则在会通中着力于以传统“敬天”<sup>①</sup>资源重释“天”,更多具有宗教意味。

许三礼(1625—1691),字典三,号西山,清初安阳人。早岁曾受业于孙奇逢门下,其著作主要有《政学合一集》、《圣学直指》等。在学术上,许三礼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先生以明儒宗良知,每本心而不本于天,故论学揭出一天字,而实之以仁孝,谓‘舍敦伦之外,更何处可见实行?极之利爱民,爱万物,格天地,劝鬼神,赶风雷,贯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所推而至焉者!’”<sup>②</sup>但在对“天”的理解中,他将天理解为信仰实体而走向“告天之学”。“效宋赵抃故事,旦书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尝称为道学云”。<sup>③</sup>

综观许三礼的为学理路,也是来源于孙奇逢。他与薛凤祚一样,也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两会通推进,在具体手法上,也是扩张视野,会通于圣人,进而天人合一,总归于天。所以,在许三礼的《海昌会语》中首列“夏峰孙钟元先生讲学”,而把“理学宗传叙言”<sup>④</sup>全文抄录,实际上,孙奇逢根本就没有到过南方,当然更不可能讲学。正是如此,其友姜希辙在为《海昌会语》作的序言中就直接把许三礼的工作看作是对孙奇逢思想的深化发展。“近见孙钟元先生《理学宗传》,先之以十一子而诸儒附之,其识见固伟,使再进高刘为十三子,则更无疑议矣。向学于夏峰,继学于蔚州,其渊源有自,可以补前贤之未尽,因序会语而聊发其端”。<sup>⑤</sup>与孙奇逢和薛凤祚不同,在于许三礼吸收了两汉谶纬的知识资源而把“天”定位为更具有主宰意味;除了日用伦理的坚持之外,他特别注重礼的各种各样仪式(“告天”仪式)沟通天人。<sup>⑥</sup>正是如此,现代人看来有点宗教味道。但就许三礼的整体思想来看,这点宗教味道确实微不足道,因为他本质上是理学家。“许三礼之敬天思想的核心,便是藉告天仪式而重整天人关系,故其学亦可称为告天之学,其枢纽就是作为意志主宰神的‘天’,或曰上帝、帝天。他一方面据此对整个儒家道统加以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又以此一线贯穿,形成了一个条贯有序的思想系统。毋庸说,这个系统仍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旨归的构造”。因此,“换言之,它不过是在程朱的‘太极’、‘天理’以及陆王的‘良知’、‘仁体’之上,之先找到一个创造的本原,下面接续着的,则仍然是‘八条目’之类的人间功业,而贯通天理人道的线索,仍然是万物一体、

① 在古代中国,对天的理解虽然千差万别,但“敬天”的意识及其礼仪化的仪式,自远古便已开始了。作为古代敬天仪式的“郊祭”,其内容是“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礼记·中庸》)。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②③ 徐世昌《许先生三礼》,《夏峰学案》,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第57页。

④ 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71页。

⑤ 姜希辙《海昌会语》序,见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5册,第463页。

⑥ 许三礼告天的经典依据完全是儒家的。参见刘耘华《依“天”立义: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汉语基督教学术评论》2009年第8期。



天人一气之‘仁体’、‘中体’”。<sup>①</sup>但据此认为“程朱理学之‘理’以及陆王心学之‘心’在许三礼的思想系统中都变成了次一级的概念,相应,原来在程朱与陆王系统里具有本体意义的太极、性或良知、心体,也都是如此,都是‘天之所与我者’,其本源在‘天’”,<sup>②</sup>则是不太准确的。在许三礼的思想中,原来在程朱与陆王系统里具有本体意义的太极、性或良知、心体,与许三礼所强调的“天”实际上无所谓高低之分,都是“透本源、彻全体”的世界本体的另一种别名而已。只要“识彻全体,学透本源”,所有儒家关于世界本体的话语都是完全可以打通的。王阳明如此,孙奇逢亦是如此,“只要你明确‘理’的绝对本体性,用什么概念代指它,都无关紧要”。<sup>③</sup>许三礼亦然。

实际上,虽然历经晚明之变,直到康熙初年,思想界的会通还在不断深入推进,就夏峰北学也是如此。正是在会通基础上的推进,使得夏峰弟子在侧重点上有所差异、分化。但到康熙初年,会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无法继续深入。笔者认为原因包括三个方面:1. 会通的本身难局“中”的难以把握。当政治不开放之时,矛盾太多,形势太复杂;当形势危急或者权力集中逼知识人站队之时,会通会被认为是“骑墙”“调和”而不被各方认同;同时还有对会通者本身的能力的极高要求。2. 晚明以来的会通超出了预期,会通的误用与滥用,导致在思想界反会通潮流的兴起。3. 由于清初政府对皇权体制的迅速接受、磨合以及此后皇权主义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重建,一方面虽然使得整个元朝都没有出现的统治民族被汉化的忧虑在清初就出现了,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皇权主义的迅速重建及由此的满族汉化,抽空了明代遗民的整个基础而使清帝国稳定下来并在皇权建构中迅速推进。就知识界来说,就是从顺康之间开始的专制皇权对知识人的密集的意识形态调控,专制制度的设计越来越严密、精致,由此不但导致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更进一步可以从制度建构中对知识软硬兼施。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与政治的双重作用,使得新知无法继续传入,原有的知识资源利用殆尽而无法突破,晚明以来的会通在顺康之际面临山穷水尽而不得不转向。到康熙之际,随着大一统皇权的进一步推进,清政府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权力规范学术运动从而重建人们的历史记忆,其中以四库全书的编撰达到高潮。在其中,晚明不同的思想被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不断地重新分类、整合,而跨越明清之际的夏峰北学更是首当其冲。孙奇逢、许三礼、薛凤祚<sup>④</sup>的思想都被不断重新整合包装,当然,其会通难以理解也势所必然。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② 刘耘华《依“天”立义: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

③ 李之鉴《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④ 比如,孙奇逢最重要的著作《理学宗传》四库全书就没有收录。关于许三礼、薛凤祚的批评,参见永瑢《政学合一集提要》,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第1140页;永瑢《圣学心传提要》,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第314页。

without producing modern *hospital model*. In a word, medical mode, which is caused by traditiona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the result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it is similar to the handicraft product. Moder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the result of industria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factory work. Whether traditiona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helpful laterally to the reform of the moder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ust consider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 Studies on the Importance and Evolution of Xue Fengzuo's Thought

Wang Jian

Despite many modern scholars believe about Xue Fengzuo, the reason why he left his teacher, Sun Qifeng, was not the *emptiness* of Sun Qifeng's philosophy. Xue Fengzuo created his philosophy which took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elements, relied heavil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Tian*, which was precisely this eclectic style of Xue Fengzuo that allowed him to take the already inclusive thought of Sun Qifeng and improve upon it. This unique creative style w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ll of Sun Qifeng's disciples.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marked the resu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s the one and only state ideology, leaving no room for any other systems of thought, which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need for the eclectic philosophies of Sun Qifeng and Xue Fengzuo, and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ir thought.

### The Origin of the Word *Company* in Chinese

Jiang Peng

There is much evidence showed that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Gongsi* in Chinese sociality might be attributed to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The Chinese word *Gongsi*(company)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late seventeen century, which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owner or the group of the owners in maritime trading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Southeast Asia area. In Batavia, there was a kind of *Gongsi* engaging in managing funeral affairs and gaming, and its capital was owned by its members by shares. In west Kalimantan Island, the *Gongsi* based on the fellow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was involved in mining, agriculture and even public affair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re were many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ame of *Gongsi*, such as *Yi Xing Gong Si*. From 1870s to 1880s, a large number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the name of *Gongsi* (company) appeared in Chinese mainland.

###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Dai Jianping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represented by IPCC has become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and greatly influence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were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of science, politic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mass media.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IPCC, every IPCC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wa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consensus of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 But so called IPCC scientific consensus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balanc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not really scientific consensus. So we should not only recognize that the unscientific aspect of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may hinder the progress of climate science, but also recognize that politics of climate consensus is a challenge to China's climate politic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 Living,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Consumption of the Body

Kong Xue, Yue Yongyi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as faltering in republican Peking. This helpless posture was also mapped the bodies of the rickshaw pullers as *coolie*. The bodies of richshaw pullers consumed directly, which were most likely died suddenly in the way, often had to face the bullying of other powerful groups, such as soldiers, police, etc. With the ideas such as equality, freedom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rickshaw puller bodies also became one of the imaginaries of May Fourth literature. The writers were embarrassment to consume the rickshaw puller bod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pushed the bodies of the rickshaw pullers to the front of politics struggles. So the bodies of rickshaw pullers were also ephemerally emerged the game field among the inside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headquarters and other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Peking. As marginal and consumed groups, the bodies of rickshaw pullers have become the training field of living,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art.